



红军吹号照的幕后故事

■李广华

国庆黄金周，重读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温那段危难艰险、浴血拼搏的岁月，于心灵而言，是一次激励和净化。

《西行漫记》封面选用红军战士吹冲锋号的照片。画面里战士身姿挺拔，头微扬，腰挎手枪，号角上扬，给人一种英武振奋、声势有力的感觉。这张照片在中国革命史、摄影史上知名度极高，许多人即便没读过《西行漫记》，也见过这幅影像。

书籍选用此照做封面，足见其重要。而翻开书看的内页，前面有一组照片，第一幅仍选用这张吹号照，这就显得非同一般了。红军吹号照，名为《抗战之声》，明确地点出了照片的主题。

书里的《抗战之声》，比封面那张要素更齐全。除了号手外，右边是一面迎风飘扬的红军军旗，可以清晰地看到红旗上的红星，还有穿过旗杆部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近景有古城的废墟，远处是一片山丘。

从摄影艺术来看，照片主题鲜明、构图均衡，人物神态坚毅有力，很容易把观者带回烽火岁月，堪称新闻摄影的传世经典。斯诺不只是一位优秀的文字记者，同时精通摄影与影像记录。西北之行，他拍摄了大量珍贵图片与影像，为红军留存下鲜活的历史档案。

斯诺是第一位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向世界客观报道了西北红色根据地的情形。他1928年来到上海，作为记者遍访中国多个地区。去陕北之前，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了两年教授，有了一定的中文基础。1936年6月至10月初，他到西北采访近四个月。我们所见到的文章是他为英美报刊所写的通讯报道，曾引起轰动，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在英国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

这张珍贵的《抗战之声》是在哪里拍摄的？又是如何拍摄的呢？

1936年8月，斯诺冒着风险从西安辗转进入陕北保安采访，随后奔赴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城镇——预旺堡（今属同心县），采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采访是在前县长的一座漂

亮公馆内进行的，采访间隙，他从二楼阳台朝下张望：“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飘落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西行漫记》）。”

这是斯诺书中，第一次关注到号兵和军旗。应该说，能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采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采访的问题都特别重要，是事先准备好的，可在采访间隙，号兵们的训练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斯诺第二次写到号手是在另一章中，他写道：“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糊模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褪色：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据《西行漫记》）。”

他注意号声已经有几天时间了，也做了细致的观察，他一直在构思，好不容易找个号手们训练休息的间隙，做了采访。一名战地记者想要拍出理想的照片实属不易，其过程必然蕴含着不停地思考和设想，要等待时机、考虑光线，等一切成熟了才能按下快门。特别是对斯诺这样的“三栖”（文字、摄影、摄像）记者来讲，采访时各种手段会同时运用，相互交织，一个好的主题，构思在脑子里不知会酝酿多久。

那么，《抗战之声》是这两次中的哪一次拍摄的呢？拍摄的人物主体又是谁呢？书中并没有交代。其实，这张照片，后面还有一段传奇经历。

1936年，在红军中采访了近四个月的斯诺，急切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拍到的影像，公之于众。返回西安的旅程，费尽周折。抵达西安下卡车时，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大包不见了。“在那个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本，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

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的一个麻袋里，一起即在我们旅程后面二十英里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西行漫记》）。”第二天，卡车又返回咸阳，找到了包裹。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包裹里就有《抗战之声》的胶卷。当时，南京国民党方面在路上设有检查站，如若被发现就麻烦了。”

照片面世后得到迅速传播，对中国军民抗战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人们给予这张照片高度的赞美和评价，但并没有在意真正的号手是谁。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逝世。同年5月，《人民画报》为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刊发一组照片，《抗战之声》亦在其中。

江西兴国县走出的谢立全将军，当时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在画报上看到照片里的人物，正是当

年的自己，非常高兴，便买了一本《人民画报》。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谢立全，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几天前，国民党骑兵袭击红军驻地，抢走很多物资。上级命令他带领两个连的兵力夺回物资，谢立全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红军总部特地奖励他一套新军装。确认照片中人是自己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不是号兵，是营总支书记。斯诺见他身体健壮、军装整齐，拉他去当了一回模特。他还对后人讲：“这张照片是历史的产物，一定要谦虚谨慎，不然是要跌跤的。”

这张《抗战之声》，从拍摄至今，已走过九十个春秋。宁夏同心县城广场，矗立着以《抗战之声》为蓝本的号手雕像，背景是《西行漫记》书墙，向人们昭示着抗战烽火 的难忘记忆。当年的拍摄原址，如今也成了人们参观旅游的打卡地。



雨落波士顿

■立人

今年中秋，波士顿下起了雨。天从早上就阴沉着，雨一阵紧一阵，风也越来越大。天气预报提醒，整个周末都有大风和强降雨，出门要格外小心，在家也要关紧门窗。想来苏轼所谓“月有阴晴圆缺”，本也不只是说月亮。

外面冷清，手机里倒很热闹。微信从前一天晚上就不断跳出消息。家人朋友发来的、群聊转来的，满屏都是“中秋快乐”的表情包和图片。古人寄一句问候，要托鸿雁、等驿马，如今隔着半个地球，也不过是手机轻轻的一个弹窗。我还刷到了莫言老师拍的中秋祝福视频。看得多了，才真的有了“天涯共此时”的感觉。眼前的这些祝福，也一下子把我拉回从前在国内过中秋的日子。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怎么在意这个节日。月饼的包装盒一年比一年精致，里面的月饼却还是老样子，倒有些“买椟还珠”的意思。最怕的还是月饼那过分浓烈的甜，吃上一小块便觉得腻。如今身在异国，我反而更在意中秋这一天能不能吃到月饼。节前几天，我会特意去中国超市，也会去韩国超市转一圈，凡是有没吃过的月饼，我都愿意买来尝一尝。看看里面的馅，比较哪一种更香，哪个牌子做得更好。一块玛德琳蛋糕能让普鲁斯特回到童年，月饼也会把我带回已经走远的中秋。

中学时代的中秋，晚上照常上自习。教室里日光灯很亮，大

家低头写作业。一下课，几个人便来到走廊，趴在栏杆上看月亮。月光落在操场和教学楼上，晚风已经有了凉意。也不知是谁先动了诗兴，提议学古人写诗，于是一群人都来了兴致，各自回教室拿纸笔，还要比一比谁写得好。那时候古诗古文读得多，李白、苏轼的“月亮”早就背熟了，轮到自己写，便也忍不住往里面放“月”“秋”“愁”这些字。现在想来，倒颇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至于平仄、押韵，其实谁也说不太清楚，写出来的东西不像律诗，不像词，长一句短一句，格式全凭自己心意。可我们并不在乎，意思写出来了，就觉得已经很像那么回事。后来读《红楼梦》，看到黛玉、湘云中秋夜在凹晶馆联诗，觉得我们当年那点诗兴，也算是和古人的中秋雅趣遥相呼应。月亮一亮出来，人就容易想写几句。她们留下的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而我们留下的，是平仄未必工整但自己觉得很不错的句子。

波士顿的大风大雨到深夜没有挡住大家赴会的兴致。到了晚上，哈佛中秋舞会仍按原计划举行。车一辆接一辆停在酒店门前，雨水在路灯下发光，姑娘们提着裙摆从车里下来，同行的人替她们撑伞、扶门。门外是湿冷的秋夜，推门进去，却一下落入另一番天地。

大厅很高，一盏盏水晶吊灯从上面垂下来，千万点细碎的光在头顶闪动。放眼望去，衣香鬓影，姑娘们的礼服把大厅染成一片流动的颜色：酒红、墨绿、宝蓝、银灰、香槟金。有人穿缎面的长裙，走动

时像水面被风吹开的细纹；有人穿薄纱亮片露肩礼服，稍一转身，身上便闪起细碎的光；有人穿着旗袍，剪裁贴身，立领、盘扣间透着东方的韵味。平常不修边幅的男生也换上西装，系好领带或领结，刚见面时甚至要多看一眼才能认出来。

认识的人见面寒暄，不认识的人也很容易因为一个共同的朋友站到一起，朋友之间来来往往。新认识的人聊上几句，总会问起彼此在做什么、研究什么。听了一圈下来，我发现，许多看似相隔很远的领域，医学、设计、教育、经济学，如今竟多少和人工智能产生了联系。

舒缓的三拍子音乐响起，舞池里先跳起了华尔兹。深色的西装与长裙在灯下缓缓转动，裙摆一圈圈铺开，像花朵在舞池里绽放。舞伴随着节奏旋转，肩背、手臂和裙角连成柔和的弧线，整个舞池也跟着音乐慢慢流动。乐声渐渐变得轻快，摇摆乐的律动接了上来。脚步利落起来，手臂高高扬起，姑娘们从舞伴臂弯下旋转而过，长发和裙摆一起飞扬。两个人一进一退，一收一放，动作轻盈明快，整个舞池都带上了跳跃的节奏。

一整晚并不只有跳舞，场边还有拍照、聊天、小游戏和各种互动，朋友之间来来往往。新认识的人聊上几句，总会问起彼此在做什么、研究什么。听了一圈下来，我发现，许多看似相隔很远的领域，医学、设计、教育、经济学，如今竟多少和人工智能产生了联系。

最后一支曲子结束，乐声慢慢停下来，掌声从四周响起，舞池里的人也陆续停住脚步。大家拿出外套，互相道别，三三两两地往门口走。也有人舍不得这么早散，还留在厅里和朋友聊天，再拍几张自己今年中秋的留影。

我坐上回家的车。外面的雨已经小了，雨刷一下一下从挡风玻璃上扫过去。我又想起中学时期的中秋。那时几个人趴在走廊栏杆上看月亮，回教室拿纸笔学古人作诗。如今把同样的题目交给AI（人工智能），短短数秒，便能生成一首七言诗，平仄、押韵几乎无可挑剔。觉得哪一句不好，可以重写，觉得意境不够，还可以接着改。甚至只用几句话，就能生成一段视频：云从月前飘过去，桂树在风里摇，月光落在古人的庭院里。这些事情在中学时代听起来，几乎如同神话。

说到中秋，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多是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广寒宫传说。千百年间，人们仰望明月，把那些无法抵达的远方写进神话。而今天，人类已经将飞船送上月球，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又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火星。或许多年以后，人们会在别的星球度过中秋。我想象一个在火星长大的孩子，他读到“海上生明月”时，也许从来没有见过海，也没有见过我们熟悉的那轮月亮。老师告诉他，那是地球上的景象。他打开AI，眼前便出现一片海，浪从远处一层层推过来，月亮从海面升起。他看着那幅景象，才慢慢明白，几千年前的人为什么会写下这样一句诗。

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走的是一个圆；而科技不断向前，走的是一条从未有人踏足的新路。这或许正是中秋令人眷恋之处：无论世界前行多快，每到这一天，人们还是会停下来，看看月亮，想起远方的故人，想起曾经住过的地方，想起那些当时只觉得寻常、后来才知道珍贵的日子。

在地坛公园

■董鸿杰

站在地坛公园的门前，望着熟悉的园牌，一瞬间，史铁生的模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静静地摇着轮椅，独坐在树下，脸上带着宽厚的笑意，身影和地坛融为一体。

30年前，我曾经来过北京，看了天安门，看了故宫和长城，也来过地坛公园，只觉得这座四百余年历史的古园平平淡淡。走上一圈，看看脚下都是砖，看看周围都是树，古朴之中带着几分萧瑟。

是啊，二十多岁的我青春懵懂，许多人生境遇尚未经历，很多事情也不曾深思。更不会想到，再次来到北京，已是遥远的2026年。

二十出头的史铁生，正值最好的年华，却骤然遭遇瘫痪、失业、人生跌入谷底，前路一片迷茫。他曾经埋怨命运的不公，也曾对着母亲宣泄满腔痛苦。最后，这座寂静的地坛公园，接纳了他的悲伤和绝望，陪着他静坐沉思，悟透生死，汲取力量。

走进园中，发现里面人潮涌动，恰逢北京书市在此举办，主题正是“我与地坛”。大概是这个原因，一路上听到好多人谈论史铁生的文字。在熙熙攘攘的书摊前，我也买了一本《我与地坛》，又在书市的主背景前，举着书请人拍了照片，算是另一种纪念。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差不多在20年前。当时，刚经历过下岗，满心不忿，直到读到史铁生笔下那句“命运的局限或许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心中方才有所顿悟。

那些年，史铁生每天摇着轮椅去街道工厂做工，每月挣十几元贴补家用，一干就是七年。朋友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给大家炒菜，有说有笑，仿佛忘却了自身苦难。1980年，瘫痪的史铁生患上肾病，面对命运施加的磨难，他处之泰然，并早早立下遗嘱，

有水泥砌的粮柜。巧云父亲的相框就挂在粮柜上方的墙壁上。照片里年轻的他，隔着薄薄的相纸，严肃地注视着每个跨过门槛的人。巧云和玉美奶奶睡在东边的卧房，西屋是巧云哥哥的地盘。夜里，我同她们母女挤一张床。在家睡觉，我习惯把脑袋蒙进被窝；在巧云身侧，被子最多拉到下巴，任由脸皮裸露在深邃、冰冷、虚无的黑暗之中。巧云身上，持久地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类似于烤大蒜的味道。

我问我奶奶，为什么巧云身上有奇怪的味道。奶奶说，巧云原先掉进过茅坑，染上了大粪没洗干净。我当时信以为真，若干年后才明白，我奶奶扯了个善意的谎言。

我升入初中后，几乎不怎么找巧云玩了，她和我分在不同的班级，她也有了新的玩伴。我们在校园里迎面撞上了，笑一笑，喊一下彼此的乳名，仅此而已。初二那年，我离开了老家，再也没见到过巧云。

再次听到巧云的消息，已是远嫁浙东数年之后。回家探望养父母，我和邻居大婶闲聊，无意间提起她。大婶说，巧云在外地的服装厂打工，有个男孩爱上了巧云，向巧云表白，巧云不接受，男孩情绪激动之下做出自残之举，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我心下大骇，急急地问大婶，巧云最终有没有嫁给那个男孩？大婶两手一摊：谁知道呢？村里一批姑娘初中毕业就去了江南打工，一年到头，看不到人影儿。

我说，一个人能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巧云如果和他结婚了，保不齐要遭老罪了。大婶叹了口气，说，那怎么办？她又没有个爹给她撑腰，哥哥倒是娶了老婆，可夫妻俩感情也不好，三天两头吵架，哪里顾得上她？我默默地听着大婶絮叨，一时无言以对。

转瞬间，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孤单地行走在七月的天空下，仰望姿态万千的云朵时，会不由自主地念及巧云：如今的她，究竟落脚在何处，嫁给了谁，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没有答案。人和人，就像是飘荡在同一张天幕上的云朵和云朵，看着近在咫尺，其乐融融。风来了，雨来了。云朵分分合合，来来去去，不知所终，纵然下一次，还能幸运地相聚，也已经不复原样了。

(作者为菜场摊贩)

要将自己的器官全部捐献。

或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史铁生将写作和生命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亲身经历残障之苦，让他跳出个体对命运的哀叹，转而思索普遍的生存困境，观照人们精神上的困顿。尤其是那本《病隙碎笔》，尤其是那一句“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求，而在向内的建立”，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当代中国最具自发哲学气质的小说家”，史铁生当之无愧。

现在来到地坛公园的人，大都会去找那两棵树，一棵树上的挂牌写着“余华的朋友铁生”，另一棵则是“铁生的朋友余华”，我也心生向往，前去寻访。只是我在书市里面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跑到树林里又没有遇见，只得打开手机导航，循着地图寻找。

终于抵达，我看到两个姑娘在树下拍照，她们侧着身子，一边拍，一边陶醉地说着真美啊。是啊，真美啊。两棵国槐并肩而立、枝叶相依，带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两块认养铭牌并非余华本人设立，而是热心读者自发认养，以这样特别的方式致敬两位作家，成了一段动人的文学佳话。

在秋风里，我与两棵树告别，也与久违的地坛告别。地坛沉默不语，恰如那位身体残障、思想却无比健全的铁生。

于是，我想起了那段话：人的一生，面对的东西太多，多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不期而遇的不只有惊喜，还会有失意、残疾，乃至各种的不公和怨怒。不要悲观地认为自己很不幸，而是热心读者自发认养，其实你只是沧海一粟。

此番重游地坛公园，心怀感念，遥想天上的铁生，依旧带着宽厚的微笑。